

# 傅习、孙存吾编《皇元风雅》考论

于 飞\*

〔摘 要〕《皇元风雅》是重要的元诗总集,也是“元人选元诗”的代表性文献。同名总集在元代出现颇多,其中傅习、孙存吾所编为本文考述对象。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又曾出现多种版本。通过梳理不同版本,厘清此书的传承脉络,还原其刊刻原貌,指出其具有元代图书刊行中“随得即刊”的典型特征。同时比较主要版本的差异与优劣,能够最大限度还原此书原貌。

〔关键词〕《皇元风雅》;版本;总集;随得即刊

傅习、孙存吾编选的《皇元风雅》有存元一代诗歌、反映元代诗歌最高创作水准之目的,应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元人选元诗”总集加以深入研究。其以“风雅”名之,反映出元代中期诗人追求“风雅”的诗坛风气。然而此书在编选、刊刻以及之后的传布过程中,又出现了《国朝风雅》《皇元朝野诗集》《元诗》《元风雅》等多种别称异名,此种现象易使人们产生混淆,与其名称相关的文献均亟待梳理。

今《皇元风雅》存元刻本,王忠阁、叶盈君已做梳理<sup>①</sup>,其文可资参考,然目前学界对《皇元风雅》这样珍贵的元人原始文献仍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另外,汪桂海《元刻总集提要》<sup>②</sup>一文从文献学角度为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种《皇元风雅》撰写了提要,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针对《皇元风雅》成书、版本、选诗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为行文方便以及元代另外存世的一部由蒋易所编《元风雅》相区别,下文对《皇元风雅》前加称之为“傅、孙编”,以明笔者考论之对象。

## 一、版本与成书

傅习、孙存吾所编《皇元风雅》今存元刻本,为元李氏建安书堂刻,国家图书馆藏。李氏本所刻分为《皇元风雅》前集<sup>③</sup>六卷、《皇元风雅》后集六卷,并非同时刊刻,可视为两种。前集书前有虞集后至元二年(1336)八月序,后集书前有谢升孙同年三月序。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金元编》分别著录,两书版刻相同,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细黑口。

编者傅习,字说卿,清江(今属江西)人,尝游历四方,采集当世名人诗歌甚多。孙存吾,字如山。

\*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050024。

①详见王忠阁、叶盈君《〈元风雅〉考辨》一文,从成书、版本、文献价值等角度对《元风雅》进行了梳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但此文有许多未明及未深入之处,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补充。

②汪桂海:《元刻总集提要》,此为“中华再造善本”所撰写提要,其中收元人总集文献数种,《文献》2007年第4期。

③初无此名,后因出版后集,与之相对而言。

另有一说字存吾,名不详,号如山,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尝为儒学正,后辞官。二人生卒年俱不详,生平无考。但是编者的籍籍无名,并不影响此书作为元诗重要总集文献传世。

《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关于此书提要内容较为全面,现将《皇元风雅》前集六卷部分提要内容<sup>①</sup>抄录于下:

(《皇元风雅》)惟所收诗篇,皆就所见闻,随时辑录,故“首尾颇无伦序。或有一人而两见者,殊乖体例。然元时总集传于今者不数家,此集虽不甚赅备,而零章断什不载于他书者颇多,世不习见之人,与不经见之诗,赖以得存者,亦不少矣。”(《四库全书总目》语)顾嗣立编纂《元诗选》,曾以此本为资料来源。

.....

卷前有至元二年(1336)虞集序。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曾指出该序序文浅陋,未必出自虞氏之手,乃书肆人所假托。所言应是。

此书浸梓于李氏建安书堂,今《后集》“皇元朝野群英姓氏”后有“李氏建安书堂”刻书牌记可以为证。《四部丛刊》所据以影印的高丽仿元刊本中,此牌记之“李氏建安书堂”则已改为“古杭勤德书堂”,知元代杭州勤德书堂曾翻刻此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云,此书之外,孙存吾尚编刻有《翰林珠玉》六卷、《范德机诗集》七卷。前者题“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家塾刊”,后者题“至元庚辰良月益友书堂新刊”,则存吾离任学正之后,即隐于书林。《翰林珠玉》不知刊于何时,或犹在官学正时。《范德机诗集》必刻于致仕之后。《皇元风雅》六卷成于《翰林珠玉》、《范德机诗集》之间,时已开设益友书堂与否,今不可知,故首次刊行此书者为如山家塾,抑或李氏建安书堂,或乃建安书堂翻如山家塾刻本,今亦不可知。<sup>②</sup>

据提要内容及《皇元风雅》元刻本,并采录其他资料补充,可知信息如下:

首先,《皇元风雅》前集为傅习采集,孙存吾编次,此书原题“盱江梅谷傅习说卿采集,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编类,奎章学士虞集伯生校选”,后集为孙存吾续编,原题“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编类,奎章学士虞集伯生校选”<sup>③</sup>。此书编者傅习与孙存吾皆士履无考,今对其二人所知甚少,仅知其均为江西人。而前、后集疑为先后分别刊刻<sup>④</sup>,前后集前均有序言言明日期,有趣的是前集为“至元二年丙子八月辛巳”,后集为“至元二年丙子三月晦日”,先分别刊刻,后才合为一帙。

当然序文撰写日期与刊刻日期并无必然联系,元刻本仅有《皇元风雅》一名,并无“前集”之说,可见是有了后集以后,为了对应才有前后集之分别。而上文提要将前、后集目为两书,分别著录,说明作者也认定前、后集为两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虞集的序言晚于后集谢升孙的序言则很有可能为虞集撰写,并非书商假托。如若书商托名虞集,则《皇元风雅》前集序言应早于后集谢升孙序,不应出现这种时序前后颠倒的情况,否则刊刻之书商的确是过于粗率了。

其次,通过此书提行以及涉及元代年号,可确定为元刻本无疑,约成书于序言提及的后至元二年(1336)。后集目录后有刻书牌记,原文为:“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sup>⑤</sup>说明此书“随得即刊”的刊刻特征,前后集分别刊刻的可能性较大。考其书版等均相同,前后集出于同一书肆则无疑问。而正是由于“随得即刊”,使得此书“首尾颇无伦序。或有一人而两见者,殊乖体

①此提要内容仅针对《皇元风雅》前集六卷,而非后世与《皇元风雅》后集六卷合为一本的《皇元风雅》十二卷本。

②汪桂海:《元刻总集提要》,《文献》2007年第4期。

③关于《皇元风雅》,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可资参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70页。

④雒竹筠遗稿、李新乾补编《元史艺文志辑本》载日本东福寺藏元刊《后集》四卷本,并无前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518页。

⑤参见《皇元风雅》李氏建安书堂元刻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阅览室藏。

例”，这些正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批评，然而并不影响其保存元代诗歌文献之历史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文学总集，先刊刻部分称为“前集”或“甲集”，其后不断增补续编的成书方式是非常普遍的，一来书商急于出版发行，抢占市场；二来可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文人投赠其作品，为后来的作品收集打下基础；三来相同的书版也可以多次使用，节约成本。

除以上《皇元风雅》六卷相关编者、成书、刊刻以及序言等信息外，《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还提及与此书相关的其他版本信息：

此书在明代尚不难见到。清代则流传已稀，而内府一直藏有此本。《四库全书》抄录收入《元风雅前集》十二卷，即以内府所藏元刻本为底本，惟元本六卷，四库本为十二卷，盖有所析分之故。（笔者按：此提要针对《皇元风雅》前集，《四库全书》将前后集各六卷均进行拆分，变成了前后集各十二卷，四库本《元风雅》为二十四卷）

元人所编本朝诗选之类的书籍颇有几种，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此书（钱氏著录作“《元诗前集》六卷《后集》六卷”）之外，尚有孙存吾《皇元风雅》后集六卷，蒋易《皇元风雅》三十卷，曾应奎《元诗类选》四卷，孙原理《元音》十二卷，赖良《大雅集》八卷，另有《皇元风雅》八卷，注云：“无撰人姓名，或云宋褰。”又据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九《皇元风雅序》提到另外一部《皇元风雅》，云：“东海隐君子（丁）鹤年所辑。……取向所积篇章之富，句抉字摘，编集类次之，而题以今名。”此《皇元风雅》编选者为另一人，则其与蒋氏、傅氏、孙氏等所编选者当非一书。然诸书今大多不存，仅此书与孙存吾《皇元风雅后集》六卷、蒋易《皇元风雅》三十卷尚可见到，甚为珍罕，对研究元代诗歌艺术成就具有重要价值。<sup>①</sup>

根据以上提要所述版本信息以及其他书目著录的版本信息，现将傅习、孙存吾编《皇元风雅》版本做简要梳理：

提要中称有高丽仿元刊本，不过牌记中“李氏建安书堂”改为“古杭勤德书堂”，版刻内容不变。这说明元代杭州勤德书堂曾覆刻此本，后又流传至高丽（今朝鲜半岛）。《四部丛刊》与《域外汉籍珍本丛刊》均据此本影印，其源则出自李氏建安书堂元刻本。又据《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集总目》得知此书还有日本南北朝覆元古杭勤德书堂刊本《皇元风雅》十二卷，又有日本万治二年（1659）伊吹权兵卫刊本，日本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收录，内有“浅草文库”印，亦存古杭勤德书堂牌记。可见古杭勤德书堂刊《皇元风雅》在海外流传甚广，不仅高丽覆刻，日本也有覆刻，均受到重视，成为传播元诗的代表性文献。上文提要中言及《四库全书》本《元风雅》为二十四卷，乃据内府藏元刻本析分抄入之故，这也是现今常见版本之一。

此外，《皇元风雅》还有不同名称的版本以及清抄本多种。其中较早的有《皇元朝野诗》前后集，同为傅习、孙存吾辑，虞集校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元刻本，前集五卷、后集五卷，相较存世元刻本，前后集各少一卷。笔者认为，由于《皇元风雅》“随得即刊”之特点，书籍乃为陆续刊行，此书可能早于李氏建安本，当时有可能先将之名为《皇元朝野诗》刊行，未定名为《皇元风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按语：“范式‘天一阁’所藏，有《元朝野诗集》二册，亦题曰《元风雅》，不知何人所编，其体例与此迥殊，又传写多讹，参差失序，几至不可句读，盖断烂不全之本，无足甄录。”<sup>②</sup>此书有可能是另外一本同名之书，因为无明确编者信息，并且卷数也失序，体例亦不同。

李氏建安书堂于明代继续刊印《皇元风雅》，然而由于朝代更替“皇元”一名不可再用，便改名为《元诗》。《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集总目》著录：“《元诗》前集六卷后集六卷，元傅习、孙存吾同编，明

<sup>①</sup>汪桂海：《元刻总集提要》，《文献》2007年第4期。

<sup>②</sup>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34页。

李氏建安书堂刊本”<sup>①</sup>可证。而清抄本多从李氏建安书堂本抄出,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所录便为清抄本,此抄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虞集序后有“咸丰戊午(1858)夏丹铅精舍校写”一行,下铃“蟬隐”长方印,知此为丹铅精舍旧钞,并用其他抄本校对。

国图还藏有一清抄本,后有莫友芝跋,云:“《皇元风雅》前后集是据元刻本旧钞,盖汪闳源氏‘千元’之一也。”<sup>②</sup>《四库全书提要》载此集前后各十二卷,前集百十四家,后集百六十六家。此本家数大略相等而卷数各减半,殆与文渊阁等。稿本无大不同,特有卷帙各合并耳。同治丙寅(1866)中秋收于云间(今上海)肆中。初冬还金陵(今南京),芙衣为装,过记其端。邵亭晤叟。”此本无“丹铅精舍”字样,为另一清抄本。

提要中还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提到了另外两种《皇元风雅》,均已亡佚。一是《皇元风雅》八卷本,“无撰人姓名,或云宋褰”。书已亡佚,无从得考,然于宋褰编辑类似书目则确此事。

蒋易编《皇元风雅》有黄清老序,其中言道:“予在京见宋御史显夫(宋褰)集诗二十年,得百十家欲刊诸湖广,犹日延四方之士而采之,唯恐沧海之有遗珠也,不知今已殒梓否耶?”<sup>③</sup>可见黄清老明确知道宋褰也在努力搜求本朝诗篇,然而成书与否,究竟不得而知。另一种《皇元风雅》则有戴良作序,并收入其文集中,序中明确提到编纂者为元末著名西域诗人丁鹤年,可惜此书也不存于世。

元朝中后期,无论在朝在野,均有人努力搜求本朝诗歌,并不约而同采用“皇元风雅”一名,可见当时的诗歌创作是以追求“风雅”为导向,其间的诗学旨归值得引起学人的重视。

综上,傅、孙编《皇元风雅》前后集虽然分别刊刻,但均成书于后至元二年(1336),后覆刻合为一书。元刻本有李氏建安书堂与古杭勤德书堂两种主要版本,二者属覆刻关系,书版相同。此书在编选、刊刻、流传过程中又有《皇元朝野诗》《元诗》《元风雅》等多种名称,然而内容、体例变化不大。至清代又出现多种抄本,均以元刻为底本,抄录时并无较大改动,仍依十二卷之数,元刻本大部分原貌,如印书牌记等均得以保留。清代仅《四库全书》据内府藏元刻本十二卷本抄录并厘为二十四卷,其中卷次、文字等改动最为显著,可以说是对元刻本最重大的修改。

## 二、元刻本与四库本

傅、孙编《皇元风雅》其实仅有元刻本一个版本系统,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除了书名不得不改变(后世“皇”字不可沿用),其内容、体例基本保持不变。若说改动最大的便是《四库全书》在抄写元刻本时做的拆分,现以李氏建安堂元刻本(简称元刻本)和四库本《元风雅》(简称四库本)为底本,进行比较研究。

先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傅、孙编《元风雅》的评介:“前集首刘因,凡一百十四家;后集首邓文原,凡一百六十六家。间载作者爵里,俱不甚详。所录江西人诗最多,盖里闲之间,易于撷拾,惟一时随所见闻,旋得旋录,故首尾颇无伦序。或有一人而两见者,殊乖体例。然元时总集传于今者不数家,此集虽不甚赅备,而零章断什,不载于他书者颇多,世不习见之人,与不经见之诗,赖以得存者,亦不少矣。”<sup>④</sup>四库馆臣对其评价大体客观,既肯定了《元风雅》保存文献的功绩与价值,也指出了其在编纂过程中的缺点与疏漏,对于今人认识此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其中也有些问题留待解决,如收录作家家数、编选体例等,需要在两个版本的比较中得以明确。

①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印:《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第1213页。

②汪士钟,字春霆,号闳源,清代藏书家,曾据所藏宋元本书编写《艺云书舍宋元本书目》一书。

③蒋易:《元风雅》自序,《宛委别藏》本。

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634页。



其一,元刻本虞集序与谢升孙序分别位于前、后集之前,形成对应关系。而四库本将之列于全书之前,使之符合四库修书之体例。但如此一来则前、后集分别刊刻的成书过程便隐而不显,两种序言又针对前、后集分别撰写,二者均列于正文之前且谢升孙序还在虞集序前,虽是根据序言撰写时间排列,但终究无法对应前、后集,因而更难看出元刻本原貌了。

其二,四库本在目录上对元刻本也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不仅卷次上由原来的六卷分为十二卷,在文字上也有改变。以前集为例,据四库本目录,前集收录诗人115家,非《四库提要》所言114家,遗漏一家。而元刻本目录一开始便将刘因遗漏,而是自伯颜丞相始,共113家。若四库本是将元刻本卷数两两拆分,那么四库本一、二卷对应元刻本第一卷,其中元刻本遗漏刘因一家;四库本三、四卷18人,元刻本第二卷17人,其中16家相同,四库本多聂古柏、叶友竹二家,元刻本多俞石涧一家;四库本五、六卷与元刻本第三卷家数相同,仅袁伯长与欧阳圭斋次序颠倒;四库本七、八卷对应元刻本第四卷,元刻本多出刘明叟一家;四库本九、十卷对应元刻本第五卷,二者家数次序相同;四库本十一、二卷对应元刻本第六卷,四库本多出先一初一家。由此看来,二者家数大体相同,差别并不明显。但可看出元刻本编辑目录时有所遗漏,刘因、聂古柏、叶友竹、先一初于正文中均有诗歌而目录未显。而元刻本目录多出俞石涧与刘明叟二家为四库本目录所无,查元刻本正文,并无此二人诗作收录。

由此可见,四库本目录对于元刻本目录做了很好的修正。四库馆臣对于元刻本的修正还表现在文字上,如目录中诗人多以字号或官职行,四库本目录在名字后有名可考者则用小字注出,如马伯庸(祖常)、贯酸斋(云石)、交趾王(陈益稷)等,是对目录的有益补充。另外,四库本将元刻本揭曼石改为揭曼硕,是为改正误字;而伯颜丞相改为巴延丞相,则是对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名字的统改。

其三,《元风雅》后集的四库本与元刻本内容相同,目录上四库本在姓氏下仍加小字注出人名,如邓善之(文原)、毛静可(直方)等。但后集的主要问题在于重出之人较多,这主要因为其中有一卷的体例与其他卷次不同。此书体例明显为以人系诗,先列人名,后列其人诗作,而后集元刻本卷四先后录有《四爱题咏》及《梅野诗序》,乃是以诗题系诗,后为诗人作品,这就变成了同题集咏,因此产生重出之人较多的问题。这大概就是《四库总目》所谓“或有一人而两见者,殊乖体例”的地方吧。四库本的做法则在目录中直录姓名,未录诗题,这样在目录的形式上看是统一了,但也掩盖了人物重出的真正原因。对于正文文字,由于涉及内容较多,无法彻底更改,若再修改后集可能在体例上会更为混乱,保存原貌已是最好的选择。

总的来说,元刻本显示了《皇元风雅》的原貌,但由于当时编纂水平有限以及“随得即刊”的刊行方式使得此书本身就存在一些不足,四库本通过对元刻本的抄录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然并不能彻底改正原书体例的既有问题,

尽管如此,四库本的改订之处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首先,元刻本流传时间长,书版既久,许多文字已难以辨认;四库馆臣从中抄出,字迹清晰,为后人之阅读提供方便。其次,四库本目录下均有小注,对于明晰作者提供了诸多方便。再次,四库本对前后集目录有所修正,并据正文重新编目,修正了原有目录之差错。最后,四库本将原十二卷本分为二十四卷本,对于作者的划分能做到更加细致。总之,四库本是现存版本中对于元刻本修改最大的一种,其改订之价值值得肯定。

### 三、《皇元风雅》的选诗

《皇元风雅》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元代诗歌文献,在选录过程中也体现了编纂者的诗学追求与审美倾向。

其前、后集开头均有“虞集校选”字样,可见虞集应是参与了此书最后的编选工作,他的序文正可以反映出编辑此书的目的。其序言道:“诗之为教,存乎性情。苟无得于斯则其道谓之几绝可也。皇元近时作者迭起,庶几风雅之遗无愧骚选。”<sup>①</sup>可见此书名为“风雅”则以诗教为选录标准,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sup>②</sup>诗序认为诗歌的发生皆缘于情,诗歌乃是情之所至的必然产物。因此元人论诗特重“性情”二字,虞集也不例外,他将性情作为选录标准,并称所选作品无愧于《骚》《选》,则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参照标准。同样,谢升孙的序言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诗者,斯人性情之所发,自《击壤》来有是矣。然体制随世道升降,音节因风土变迁。以近代言,唐诗不与宋诗同,晚唐难与盛唐匹。我朝混一海宇,方科举未兴时,天下能言之士一寄其情性于诗。”两种序言均提到了“性情”二字,可见其中“风雅”也实由“性情”而出,这体现了元人的诗歌观念与风尚。而要理解元诗,我们首先要了解“性情”二字。

中国的诗教传统,《诗》成为经,便成了中国诗歌的纲领,而诗教又可以“风雅”名之。“性情”二字是从诗教中来,而“吟咏性情”本是中国古代诗歌一贯的主题。到了元代,似乎以性情论诗变得特别发达,“性情”成为了元代诗人的自觉追求。查洪德认为元代诗人主张以性情论诗,而性情本身的含义则是复杂的,但是其中一个可以确定的原因在于“桃宋归唐”,即肯定唐诗,反对宋诗<sup>③</sup>。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于,元代诗人虽然大多数宗唐,但是所取较为广泛,与明代前后七子诸人专宗盛唐俨然不同,所学是更加多元的。因此,元人的“性情”便具有多元的含义,就本书而言,其主张以虞集的诗学主张为依归,因此虞集的性情论更加贴近傅、孙编《皇元风雅》的选录标准。

虞集作为“元诗四大家”中成就最高的诗人,其诗论在元代中期占有主导性地位,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就“性情”而言,虞集主张“性情之正”<sup>④</sup>,或者说“中正平和”是虞集的诗学主张,这也是虞集总体诗学主张的体现。元代社会进入中期之后,社会安定,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南北方诗风在不断的激烈交锋中走向融合,诗风亦是各取南北之长,终于变得平和圆融。此时,符合盛世之音的诗歌主张也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发乎性情、归于雅正的诗歌理念也更能够深入人心。《皇元风雅》成书于后至元二年(1336),正是元代中期进入尾声的时候,《皇元风雅》虽然存有保存一代之诗的目的,广泛搜求,但是即以“风雅”为名,肯定受到了当时诗坛风气的影响。

就《皇元风雅》选诗内容而言,其所选确属元代上乘之作。两集之中,选诗数量最多的为赵孟頫(字子昂),其次是“元诗四大家”,其他元诗名家如欧阳玄、黄清老、黄潜、柳贯、袁桷等选诗不在少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皇元风雅》选录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较多的有贯云石、萨都刺、马祖常等人,不仅选诗较广,也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诗坛的创作情况。傅习、孙存吾所编这部《皇元风雅》可以说是对元代中前期诗坛优秀作品的较好收录。

前集开篇取元初著名北方诗人刘因的《黄金台》:“燕山不改色,易水无新声。谁知数尺台,中有万古情。区区后人,犹爱黄金名。黄金亦何物?能为贤重轻。德辉照九仞,凤鸟才一鸣。伊谁腐鼠弃,坐见饥鸢争。周道日东渐,二老皆西行。养民以致贤,王业自此成。黄金与山平,不救兵纵横。落日下荒台,山水有余清。”这首五言古诗被多种元诗选本收录,在当时已是脍炙人口。黄金台本为招贤纳士之地,而今被人记住的只是黄金之名,历史的沧桑在落日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悲凉。元初北方诗风中的雄浑、苍凉之感应运而生,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心中涌起无限遐思,伤古悲今,感慨遥深。刘因

①《元风雅》虞集序,《四库全书》本。本文引用《四库全书》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不再说明。

②《毛诗注疏》卷一,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③查洪德:《元代诗学性情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④查洪德:《元代诗学性情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的其他诗歌也可以说是其代表作。难得的是,刘因之后编者选取蒙古人伯颜丞相诗二首,其中第一首《度梅关》最为有名:

马首经从庾岭归,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

伯颜丞相的诗歌今仅存四首,《皇元风雅》便保存了两首,文献价值极高。此诗写于伯颜丞相班师回朝的路上路过庾岭的所见所感。诗歌不长,文意浅显晓畅,感情却十分真挚动人,显示了少数民族诗人初步学习汉诗的样貌。伯颜丞相作为军事统帅,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却能够用汉语写下这样较为成熟的诗作,可以视作蒙汉文学交流的代表事例。<sup>①</sup>

元代重要的诗人及其代表作品多收录于《皇元风雅》前集,编纂者对于前集的编选更为用心,作品成就自然也更高一些。相比而言,后集选录的诗人更像是在努力保存诗歌文献,故而后集收入的诗人数量虽多于前集,但就单个诗人诗歌的入选数量来说,则多不如前集。也许正是由于前、后集这种不同的分工,在后集中出现了两组同题集咏的作品,显然乖违体例。

但换个角度看,这或许也是后集的特色,可以《梅野诗叙》为例进行说明。虞集先作诗叙说明作诗原委,以“梅野”二字之由来为核心内容,后作诗一首,其诗末及诗叙有趣。但其后詹厚斋所作一首五绝似乎更有风味:“江路梦初回,犹疑香是雪。野意正微茫,疏影寒窗月。”此诗将“梅”“野”纳于诗中,却写得飘渺虚幻、清冷孤寂,一份幽暗伴着淡淡的梅香,缓缓袭来,这香味映照于冷冷的月光之下,野味更浓。《皇元风雅》选录诗歌以诗题为中心这种形式在整个集子中都极为少见,但是却丰富了诗歌的形式,据此可窥见元人作诗之一斑。此前的《四爱题咏》有诗有文,参与者众多,反映了诗歌早已是元代文人交往的重要活动方式,并为喜爱汉诗的少数民族诗人所接受。当然,就这一点而言,元代的其他诗歌总集,尤其是唱和诗集会有更为集中的反映。

总之,《皇元风雅》作为元人诗歌总集的代表,无论从选诗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来说,都对于我们认识、了解元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在今后广泛的流传以及众多的版本就是最好的证明。

(责任编辑:高峰)

## A Textual Examination of *Huang Yuan Fengya* Compiled by Fu Xi and Sun Cunwu

YU Fei

**Abstract:** *Huang Yuan Fengya* 皇元风雅 (literally *Royal Anthology of Poems in the Yuan Dynasty*), an important anthology of poems in the Yuan Dynasty, is a masterpiece compiled by the editors in that period. There are many collections of poems bearing the same name, but in this paper, we just focus on the anthology compiled by Fu Xi and Sun Cunwu. Even their collection has many editions in history. Through examining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book, we try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how it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On this basis, we argue that this antholog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published once available”, which was a typical feature of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in the Yuan Dynasty. At same time, we try to reconstruct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antholog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rough compar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book.

**Key words:** *Huang Yuan Fengya*; edition; anthology; published once available

<sup>①</sup>详见云峰:《伯颜及其诗歌散曲创作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4期。